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和安全

——关系演进和经验总结

孙照红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发展与安全是关乎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国之大者”。一百多年来,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在为“站起来”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安全主导发展,以“革命”为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为“站住脚”而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采取的是安全优先于发展的战略策略,“建设”和“发展”让步于“革命”和“安全”;在为“富起来”而奋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更强调发展之于安全的先决意义和主导作用,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发展、保稳定;在为“强起来”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统筹发展和安全,把二者作为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协同推进。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牢牢把握“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升党统筹发展和安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方面的优势,将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 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图分类号: D092; D6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23)04-0019-09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23.04.009

伴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然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充满了殖民扩张和血腥掠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对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和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步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以来“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①,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和阶段性任务的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发展需要而适时、顺势调整和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成功开启、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论断以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讨^②。由于发展和安全都是相对宏大的问题,涉及内容多、领域广,而一个国家和政党在特定时段所掌握和支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任何一个时期,安全优先还是发展优先、哪种安全(或发展)更为优先,如优先解决战乱问题还是优先解决贫困问题,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或安全)还是政治发展(或安全),都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第三个历史决议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来)等四个历史时期总结党的伟大成就,突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分别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9页。

② 参见黄大慧、胡庆:《统筹发展和安全:演进逻辑与时代价值》,《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童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依据、意涵和关键抓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丁忠毅:《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遵循》,《邓小平研究》2023年第2期;方世南:《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唯实》2022年第9期等。

收稿日期: 2023-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理路研究”(22BDJ098)

作者简介: 孙照红(1980-),女,山东曹县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时序的问题,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党面临的发展和形势以及党在处理发展和安全问题上的态度和认知。

一、站起来:安全主导发展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华民族陷入发展上“落后”、安全上“挨打”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也处于险恶复杂、危机四伏的政治社会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诞生在这样的局势下,对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状况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问题。

为谋求安全,中国共产党对外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推翻帝国主义操控下的军阀、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虽然还不成熟、不强大,但在帝国主义面前无所畏惧。著名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与日本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英勇斗争,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惧强敌的勇气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担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旗帜鲜明地发表声明谴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彻底、英勇顽强的斗争,并以最大的自我牺牲换来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意志、不畏强暴的气概、坚忍不拔的信念,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必需的精神财富。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国内环境,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弥天大勇”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开展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然国民党随后即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三年多不屈不挠的斗争,党领导广大军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谋求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致力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摧毁封建制度根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伪军野蛮残暴的“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极其艰难,抗日军民缺衣少食,武器装备也极其简陋稀缺。为了克服困难,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救”。解放战争期间,土地制度改革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是党领导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让占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自觉地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为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从安全发展的辩证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发展和安全是以安全为主导的,国家领土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等都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当时革命和战争是时代主题,在民族危亡、白色恐怖、国内战争的环境下,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存在安全危机,所以,必须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二字,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党所处的革命和战争的恶劣环境,另一方面对党提出了进行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要求。然而,通过革命、武装斗争谋求安全不是这一阶段的唯一任务和目标,通过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等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唯有如此才能为革命斗争提供充足的物质力量,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有能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形成革命保安全、生产促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28年的浴血奋斗向世人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①换言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在党的领导基础之上,而党的领导以党一定的发展和安全的为前提条件,没有党的发展和安全,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就无从谈起。经过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从军阀混战、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只有50多位党员的弱小政党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拥有448.8万党员的执政党,从而实现了政党自身发展和安全,为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9页。

二、站住脚:安全先于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①。其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的主要是政权安全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解决的则主要是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是从经济、军事还是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新生政权并不稳固。从经济方面看,长期的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生产萎缩、民生困苦。从军事方面看,100多万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华南、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大批国民党残余力量与恶霸势力和惯匪相勾结,威胁新生政权安全。从国际方面看,美国等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并对新生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内外环境,新生政权要“站稳脚跟”,首要任务是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遗留任务,抵御威胁新生政权的各种挑战,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和革命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发展问题。

为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粉碎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幻想,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了特务等反动组织,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通过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娼、赌、毒等丑恶现象,扫除了社会痼疾和弊病,极大改善了社会风尚、社会面貌;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通过“五反”运动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另一方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方针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把“工业化”作为目标并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

经过长年战争,新生政权本应聚焦发展,休养生息、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然而,新生政权面临的各种客观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决定了当时没有条件全心全意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安全是新执政的共产党的头等关切,所以,当威胁新生政权安全的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央政治局仍然作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定,目的是为发展争取和平的环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有力捍卫了我国国土安全。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重点考虑的问题。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并支持蒋介石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挑衅行为,此时的毛泽东试图平衡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作为“两件大事”：“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②。《论十大关系》是一篇贯穿着统筹兼顾、统一协调思维方法的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全面考虑了关涉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要关系,并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作为“十大关系”之一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但是,在客观形势面前,毛泽东总体上仍然不得不采取安全优先的战略策略,即以安全为前提来配置资源、谋划发展,优化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与国防相关的重工业便是这一思路下的现实选择,著名的“三线建设”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三线建设是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要求将沿海地区的优势部门向内地转移,将工业、科技、国防等生产资源向三线地区调整。换言之,这一阶段,党采取的策略是发展让步于安全、建设让步于革命。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后,革命话语、斗争话语成为主流,发展话语、建设话语被边缘化。

这一阶段国家建设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安全优先的权衡和抉择。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包括钢铁和机械等在内的工业建设、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还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是以国防、军事安全为中心的,都是安全主导的发展成就。“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③。毛泽东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9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对现代化设想的变化,即增加“国防现代化”,也能够反映出他对于安全的高度重视。“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次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第一个氢弹成功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都是与国防相关的科技发展成就,是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简言之,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生产发展更多集中于与政权安全、国防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工业领域,在国防科技、国防建设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了适应政权安全需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富起来:发展主导安全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结合当时世界经济正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适时地作出时代主题已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适时地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适时地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解决贫穷和“挨饿”的问题,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①,简单地说就是要“富起来”。与这些转变和党的主要任务相适应,党在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问题上更多考量的是如何发展以及以发展为中心的安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发展”话语逐渐占据主流。

邓小平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对发展和稳定关系的一系列阐释上。在谈发展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②。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才能提升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发展,邓小平有一系列的论述,系统地回答了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等基本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保持政局稳定,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和稳定。“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③。如果经济发展上不去,不仅没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而且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隐患。

在谈稳定问题时,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④所以,“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就着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彻底肃清“四人帮”在组织上、思想上残存的不安定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趁机散布“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观点和言论,社会上出现了质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⑤另一方面,邓小平在谈稳定问题时,始终是把它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⑥。“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⑦。可见,在邓小平的话语中,稳定是为发展创造条件,要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但不能为了维稳而错失发展时机,维护稳定的手段也要灵活。比如,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既强调“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⑧,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为港澳回归祖国和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时,邓小平优先选择和平、共赢的方式,他提出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也是为了避免中国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从而更专注于自身发展。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8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5页。

这一时期,基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客观研判,党在权衡发展与安全关系问题时更侧重于发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阶段我们党在发展和安全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发展为中心,是兴国之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也满足了人民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迫切渴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保障了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的安全性,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四、强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意味着今天我国的发展和安全的必然不同于传统的发展和安全的,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发展和安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时空领域也更为宽广。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概念和理念,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到“统筹发展和安全”,并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①列为专章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表明党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更深入、更系统。事实上,无论是“发展”还是“安全”,本身都是内涵丰富的概念;“统筹”即统一筹划,统一部署,通盘安排。“统筹”二字本身就包含着对新时代国际国内大局势的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内含着各种因素相互联动、深层影响的意蕴。“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顶层设计必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国家存续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②一个翅膀飞不起来,一个轮子跑不稳当。“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意味着发展和安全不再是一个主导一个从属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③。“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④。发展和安全是同样重要的“两件大事”,在处理二者关系时,不能顾此失彼、重此轻彼,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而要真正把二者“统筹”起来,走发展和安全并重之路,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从学理层面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时兼顾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从本体论来看,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上的发展和安全问题,都是“统筹”的对象和范围;从方法论来看,无论是理念、制度还是具体措施,都需采取“统筹”的方法。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揭示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就是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统一,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也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侧重于本体论,即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实现其平衡、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侧重的则是方法论,即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来解决发展和安全中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多的是回答统筹什么的问题,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多的是回答如何统筹的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落实。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5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5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1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22页。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过程中不断探索发展和安全的规律的结果,是对党成立百余年来治国理政实践的客观分析、经验总结,是对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和安全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二者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①。这一定义一方面表明安全不再局限于政权、主权、领土等传统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生物安全等都属于安全范畴;另一方面,这一定义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纳入“安全”范畴,表明安全和发展彼此融通、相互影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同频共振、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和安全看作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由于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社会主要矛盾和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党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有不同的考量和侧重,并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手段。与此相对应,中国从一个发展上“落后”、安全上“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跃升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令世人惊叹的脱贫攻坚成果、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不断得到满足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的结果,是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特征、国际国内形势任务、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妥善解决发展和安全中的现实问题的结果。回顾和梳理百余年来党在发展和安全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深化、理论深化、实践深化过程,对于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参考作用。

五、经验总结:基于立场观点方法的分析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②。四个历史分期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所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虽有不同,但都统一于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探索、伟大征程之中,都是中国现代化接续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具有承前启后、一以贯之的鲜明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和安全始终是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审慎思量问题。“还原和再现历史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凝练和总结经验的本源性条件与可靠路径。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党自身的成长壮大和党领导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党的成功之道和优良传统”^③。今天,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必须总结并吸收借鉴百余年来党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基本经验。

(一)人民至上谋发展和安全

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和安全观的核心价值。发展和安全,最终都具体化为人的基本的现实需求,脱离有血有肉的人,离开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所谓的发展和安安全都是空谈。纵观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百余历程,无论是谋求发展还是维护安全,我们党都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很好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是为了维护饱受剥削之苦、战乱之苦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获得政治、经济上的翻身和解放,是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同时激发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把“小康社会”纳入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之中,是为了满足普通百姓对殷实宽裕生活的期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随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4页。

^③孙迪亮:《党的百年历史成就和经验的唯物史观底蕴》,《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自然会去追求发展需要和安全需要,人民希望吃的更好、穿的更美、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更舒适、教育质量更好、医疗水平更高、安全更有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提出,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并提,并把“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纳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之中,是为了让人民成为发展和安全的享有者、参与者,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

(二) 自信自立谋发展和安全

自信自立意味着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说了算,不依赖外来力量,不受他国支配或控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照搬“城市中心论”、照抄共产国际教条、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使中国的发展走了弯路,安全上更是陷入危局。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上,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和实践经验不足,我国曾模仿苏联,结果在中苏矛盾和冲突加剧时陷入被动局面。自1958年起,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①的方针,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勒紧裤腰带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靠独立自主、自信自立,中国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信自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和安全主导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这些“国之重器”上,中国共产党坚持自立自强,努力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嫦娥”奔月、“蛟龙”入海、“北斗”组网……这些领先全球的技术使我国发展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得到维护,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更加坚定。

(三) 守正创新谋发展和安全

守正创新关键是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来看,“不变”的是党对发展和安全问题的重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党都没有单单为发展而忽视安全,也没有单单为安全而放弃发展。“变”的是发展和安全的内涵、内容以及党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具体策略措施。无论是发展还是安全,在内容和内涵上都呈现出不断拓展、深化的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富强民主文明”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变,反映了发展内涵和内容的不断拓展;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到新时代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安全内涵和内容的不断延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②,突出的正是“大安全”理念和科学统筹的系统方法。纵观百余年党史,在为“站起来”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为“站住脚”而努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发展和安全的权衡上侧重主权安全、政权安全,无论是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都是政治安全,是政治安全主导经济发展。在为“富起来”而奋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发展和安全的权衡上更侧重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是发展主导安全。在为“强起来”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面对的风险和挑战、矛盾和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则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这种“变”与“不变”正是守正创新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坚守“不变”,始终如一地重视发展和安全,党才没有迷失方向,没有犯颠覆性错误;正是因为随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世界之变而灵活应“变”,才得以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也只有在变局中把握规律、在乱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页。

局中趋利避害、在斗争中争取主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才能谱写“中国之治”新篇章。

(四) 针对问题谋发展和安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即矛盾。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是根据时代任务的发展、矛盾问题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要应对“内忧”又要解决“外患”,“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军事斗争、武装斗争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必须“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既是发展问题,又是安全隐患,而“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发展”方面的需要,又包括“安全”方面的诉求。在三万多字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发展”一词出现了 239 次,“安全”一词出现了 91 次,进一步凸显了党对发展和安全问题的重视,要求党不断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认识自觉、行动自觉,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五) 系统整体谋发展和安全

系统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洞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凝练出的优良传统、实践经验和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系统观念认识、分析、把握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妥善处理武装斗争和发展生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1933 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提出,一方面,“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另一方面,“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①。这些论述事实上阐明了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如何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体现了毛泽东的系统思维。邓小平坚持以系统观念认识、把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国防、党的建设等在内的系统工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②体现了邓小平的全局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高度,将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安全这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③的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二字、“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体系”二字,凸显的正是系统观念和“大安全”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是系统观念的集中体现,是通过顶层设计和系统营造,从整体上谋划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既实现高质量发展,又实现高水平安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矛盾风险挑战面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系统观念仍然是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

(六) 胸怀天下谋发展和安全

发展和安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由于生产和交往的不断扩大,不同国家和民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和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去考察。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坚持胸怀天下”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一方面,胸怀天下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情怀、追求。“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④。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谋发展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0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464、467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0 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781 页。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1 页。

还是谋安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传承弘扬和忠实践行。从李大钊“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到毛泽东的“太平世界”再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抱负和担当;从过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情怀、大担当。另一方面,胸怀天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在谋划发展和安全问题时不仅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大历史”,还要全面把握“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正是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认识到“半殖民地反封建”的社会性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反帝”与“反封建”一起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中。正是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的发展和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考量,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考量,提出“共享发展”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中,体现的正是“胸怀天下”的高站位、大格局、宽视野。

六、结语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一定带来安全、安全必然促进发展。一些国家看似安全却没能发展起来,一些国家看似发展良好却屡屡陷入安全困境,足以说明“发展和安全很难自动进入互相促进的自我强化螺旋”^①,实现二者的协同并进也非易事,因此需要权衡协调、妥善处理、统筹安排。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和传承发展,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统筹考虑,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理性思考和应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其重点在“统筹”,涉及主体、内容、对象、过程、领域等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在中国,具有这个统筹能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统筹,强调的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因此离不开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或者说,统筹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国成功开启、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是对中国共产党统筹能力的强有力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良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及其治理效能的强有力证明。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建立在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升党统筹发展和安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必须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方面的优势,并把这种制度优势具体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治理实践中,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责任编辑:马建强]

^①何艳玲、汪广龙:《统筹的逻辑:中国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实践分析》,《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